

书信·日记·自述:鲁迅与宫竹心(白羽)交往考释

赵牧

(许昌学院 文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白羽原名宫竹心,1920年代初他与鲁迅的交往,对其日后武侠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对此存在着误区:一方面,鲁迅对落拓文学青年的热情被强调,却忽视了他的冷热变化;另一方面,鲁迅及新文学观的影响被凸显,却屏蔽了白羽武侠转向的内在原因。这跟二人文化身份的不对等及新旧雅俗文学的等级划分不无关系。如今,新文学所象征的高雅品格已黯然退色,但在白羽的评述中仍不乏文学精英意识招降纳叛的企图。

关键词:鲁迅;书信;白羽;宫竹心;雅俗对立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040-05

研究民国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白羽是绕不过去的,而若论及白羽,则又几乎都会提及他早年跟鲁迅的交往,其大致过程已为鲁迅书信和日记所载,白羽本人的《话柄》也有较详尽的追述。那时,他还没有“白羽”的笔名,出现在鲁迅笔下的是宫竹心,附丽其上的是一个落拓的文学青年形象。他后来事与愿违因混饭吃写武侠小说而走红通俗文坛,这是当年未料到的。更让他料不到的是,在驾鹤几十年后,坊间与学界都期待为昔日盛行的新旧雅俗重新洗牌,对白羽的阐释仍绕不开鲁迅及其所代表的新文学这个大前提。

因为宫竹心从鲁迅那里得来的教导,才给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新气象,这是宫竹心乐于承认的,但却未必不是武侠的悲哀,这意味着武侠类型仍要在既有的新旧雅俗等级框架中才能得到有限的论述。在此情形下,通俗小说似乎已摆脱文学史中的隐匿状态,但其所以被论述,不过是因为文学精英意识招降纳叛的企图。检讨这一阐释框架,会涉及太多复杂的纠葛,本文只以鲁迅的书信和日记、宫竹心的自述及相关评说为切入点,考释某些可能被遗漏和忽视的细节,探讨鲁迅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宫竹心,并对其武侠小说阐释框架进行勾勒。

一、由“热”到“冷”:鲁迅与宫竹心交往的全过程

鲁迅书信及日记多处涉及宫竹心,宫竹心自传也特别述及,表达了对鲁迅深切的尊敬和仰慕,对曾经的提携无限感激与歉疚。在通常的文学史叙述中,宫竹心并无文名,而作为抗战前活跃在京津地区的记者,曾因真实报道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出狱而名声大噪,此后“白羽”之名在华北出现了“家家读钱鏢,户户讲剑平”的武侠盛况,稿酬从每万字4元涨到了每千字10元以上^{[1]179-180}。据其自传《话柄》,“生而为纨绔”^{[2]1},却少小立志从文。18岁时父亲去世,财产又遇窃贼,“民十七之前,我历次当过了团部司书,家庭教师,小学教员,邮员,税吏,并再度从军作幕,当了旅书记员”,间或为《持平报》和《益世报》投稿,“辗转流离,终于投入了报界,卖文,做校对,写钢板,当编辑,编文艺,发新闻”,艰难地走上了一条“以文

* 收稿日期:2010-10-14

作者简介:赵牧(1975-),男,山东单县人,文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研究”(09BZW014),项目负责人:葛红兵;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关系研究”(2010CWX008),项目负责人:赵牧。

笔作生活”之路^{[2]8-9}。投书鲁迅,正是他不满邮局工作而欲辞职从文却又找不到出路之时。

鲁迅成为小说大家,是1923年《呐喊》出版之后。宫竹心在尚不清楚“周作人是谁”的情况下,虽然表示“我最爱的作家是鲁迅和冰心”^{[2]79},最初却是冲着周作人去的。他回忆自己“初写小说不免有北京小报的气息,文言的短篇小说力效林译”,不时“辑些古笑林”转而“写新小说”,就是受了“周作人先生译的《点滴》和《晨报小说集》”的“极大影响”,于是“从快信处得知周作人先生的详址”而“试投了一封信,志在请他介绍投稿”^{[2]74-75},恰巧周作人养病,便由鲁迅代复,因此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周作人本非热心人。据清水安三回忆,曾想通过周作人向爱罗先珂约稿,却不料“二先生”摆架子,装不在家,而是鲁迅开门相邀^[3]。鲁迅1921年7月27日致周作人信中首次提到宫竹心:“有宫竹心者寄信来,今附上。此人似尚非伪,我以为《域外小说集》及《欧文史》似可送与一册(《域》甚多,《欧》则书屋中有二本,不知此外尚有不要者否),此外借亦不便,或断之,如何希酌,如由我复,则将原信寄回。”^[4]对一个陌生人,一旦确定对方“非伪”,便不吝相助。不过,说“非伪”也并不确切,宫竹心自言“志在请他介绍投稿”,但表示的却是“找他借书”,“又以设立借书处做引子”^{[2]75}。后来他也曾说:“意思是希望他介绍投稿,可是开场白却从借书谈起。”^[5]他“自以为措辞很巧妙”^{[2]75}的信已佚,但从往还书信的互文关系中,仍可窥其端倪:鲁迅将“有多余之本”的《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各奉赠一册”,还特意寄上从《教育公报》上拆出的杜威博士讲演的“散叶”,显然是回应借书,而“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6]399},则将其作为“引子”的提议郑重对待了。

这些“伪”与其说是存心的欺骗,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成规。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向“五四运动中的出名人物”寻求支援,除极尽虔诚表达敬仰外,总要想一个合适的事体,以博取好感与信任。这种迂回曲折正是传统书信文化的成规。在最初的交往中,鲁迅热情荐稿,介绍译稿,邀约面谈,帮助考学,1921年7月29日到次年2月16日就有13封复信,几乎有信必复。如据鲁迅日记习惯,某人来或收某信,“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7],则可能更多。1926年5月27日鲁迅“午得宫竹心信”,但对这“过了四年三个多月后宫忽而写来的信”,有人认为“周没有复信,断了关系”,因为1922年2月16日致宫竹心信中就已包含“断交”的信息^[8]。

这封信让人感到鲁迅的“冷”,200多字中除简单应答外,便是几句评述,连自己都觉得“以上明白答复”有些不够婉转,但在“也很抱歉”后,接着说“至于其余,恕不说了,因为我并没有判定别人行为的权利,而自己也不愿意如此”^{[6]427-428}。这已是对某些做法不满,不愿再提批评建议了,而最初却是另一种情形。仅仅半年,鲁迅由“热”到“冷”,从现存7封鲁迅回信中,可略窥其端倪。

二、“冷”的原因:理想与现实脱节之中的急迫与窘困

鲁迅1921年8月16日致宫竹心第二信同意了访问请求,并告知家中电话号码,请“惠临”前“最好先以电话一问,便免得徒劳了”^{[6]407}。8月26日复信说“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6]411},让“热爱文学,但苦于文山难登”^{[9]13}的宫竹心很感动,似乎“希望之星在天宇里向他发出熠熠的光芒”^{[9]21}。

对宫竹心、宫蔚荷“兄妹俱作小说”,鲁迅分别推荐他们的《厘捐局》和《差两个铜元》给《晨报·副刊》和《妇女杂志》发表。《差两个铜元》先投稿给《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托周建人表示顾虑,鲁迅9月17日致周作人信中不满地说:“宫小姐之作,则据老三云:因有‘日货’字样,故章公颇为踌躇。此公常因女人而バンダン,则神经过敏亦固其所,拟令还我,转与孙公耳。”^[10]但终于没有转给《晨报·副刊》的孙伏园,而是迟至12月才发表。8月26日信末尾特意问宫竹心“能否译英文或德文”^{[6]412},有意介绍他“译述小说”,并将他译的《戏园归后》和《绅士的朋友》等发表于《晨报·副刊》。宫竹心自述“在苦雨斋见了鲁迅和作人先生”后,“承作人先生把契诃甫小说的英译本借给我;我译出五六篇,都由鲁迅介登晨报,得了千字一元的稿费。我自己又买了几本外国小说。但是我的英文很坏,抱着字典译书,错误仍然很多;鲁迅先生、作人先生都给我改译过”^{[2]80}。1921年10月27日《晨报·副刊》上,在竹心译的契诃夫小说《坏孩子》后有鲁迅附记,声明“这一篇所依据的,本来是S. Kotelianiky and I. M. Murry的英译本,后来由我照T. Kroczeck的德译本改定了几处,所以和原译文有点不同了”^[11]。

鲁迅对宫竹心“辞了职业报考学校，卖文章供学费的计划”，曾“判定”说“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又询问“两位所做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什么名字”，仿佛突然想到“再先生报考师范，未知用何名字”，大有玉成此事之意。更推心置腹地对其决意“以文学为立足”表示疑虑：“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鲁迅批评的是《礼拜六》一类杂志主持者靠“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因此便决然地建议“不必寄稿给他们的”。这意味着鲁迅主动揽下荐稿的义务，“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6]411-412}，但此后未见鲁迅介绍别的作品。译稿建议被宫竹心采纳，译出五六篇。吊诡的是，鲁迅由“热”转“冷”，似也跟宫竹心反复催问稿费不无关系。鲁迅1922年2月16日致宫竹心信起首说：“去年接到来信，《晨报》社即去催，据云即送，于年内赶到，约早已照办了。”^{[6]427}“去年”指农历，公历1月4日鲁迅收到宫竹心来信，即日答复“前回的两篇小说，早经交与《晨报》，在上月登出了，此项酬金，已将先生住址开给该馆，将来由他们直接送上”^{[6]427}，正可参照。不难看出，宫竹心对稿费的期待有些过于急切，而早年是将发表作为虚荣心满足的。此时家道中落，“穷途开始”，失去“一切凭借”，只有幻想“借这支笔，来养活我的家人和我自己”^{[2]8}，他才在旧历年前后迫不及待地恳请鲁迅催要稿费。

鲁迅一旦与某人的通信仅止于谈论琐屑事务，便预示着交往的耐心正在急剧丧失，1月4日的信便是如此，其“冷”比之2月16日有过之而无不及，类乎一个便条。第一句话“今日收到来信”，接着三句话答复三个问题，此后匆匆落款，此时可能已有被道德劫持的感觉。宫竹心后来坦言：“青年人在一个名人面前吐露自己的心情，恨不得把自己乳名都要告诉他，我于是天天去麻烦，不久鲁迅先生不敢见我了。”^{[2]81}鲁迅致李秉中信说：“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12]大概就是“不敢见”和“不复再来”，造成有意划清界限的“冷”。

三、由新文学而武侠：理想失落之际的无奈选择与愧疚之情

鲁迅1924年致函李秉中时，未必一定联想到与宫竹心的交往，但若论及“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的态度，则他与宫竹心的一场对话可作为一个恰当的注脚。据《鲁迅日记》，鲁迅与宫竹心至少应有两次以上晤面；据《话柄》，“曾谈到当时小说的题材”。鲁迅指出当时多数作品“不外学生生活”，宫竹心“附和”说“这样的题材太多太泛了，不可以再写了”；又“谈到当时的作者，为表现着同情于劳工，于是车夫乞丐纷纷做了小说的主角”，宫竹心说“这真是太多了，应该换题材了”。但让宫竹心“诧异”的是，鲁迅一连用几个“但是”，答曰“还可以写”^{[2]81}。在宫竹心的追述中，这是被用来证明鲁迅曾在文艺观上给他很大影响的，但效果却是一个张皇失措的文学青年形象。这样的谈话，鲁迅是不会有收获的，他所期待的，即便不是激烈的辩驳，起码不应是这般“附和”。鲁迅曾谈起朱安说“和她谈话没味道”，原因是“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朱安或许只是随声附和，鲁迅却依照“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的逻辑，以为她“自作聪明”，从而决定“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13]。宫竹心作为谈话对象感到某种威压，忙不迭地以鲁迅之是是为是，这让鲁迅“发生一种悲哀”，是谈话缺少对手的失落。

从“附和”到“诧异”再到“领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鲁迅无疑有某种绝对律令的意味。新文学高举“为人生”的旗帜，但通俗文学却“不再将重点置于早先的改良主题上，而着重追求属于审美方面的以讲究‘趣味’为中心的世俗化道路”，在韩云波看来，这一选择乃是沿袭“唐人小说”以来的“审美世俗化”而向着“通俗文学本体”的“回归”^[14]。而因受了鲁迅的“威压”，宫竹心却难以形成这种自觉。其成名作《十二金钱镖·初版自序》说：“白羽，懦夫之号也；白羽用此自名，何也？羽之言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辞赋尚尔,况残丛小语?叙游侠以传奇,托体愈卑;杂俚言以谐俗,等之平话。”该书题词也说:“雕虫小技图贻笑,掷笔长吟不丈夫,吹剑传奇托体卑,千言日试果何为?”他多次痛陈写这“无聊文字”的无奈,以“白羽”为笔名,不论取义于杜甫“万古云霄一羽毛”还是“取义于欧俗”给懦夫白羽毛以自贬,都饱含无足轻重和自伤自卑的意味^[15]。在他看来,关注社会人生的新文学才算正宗,“章回旧体实羞创作,传奇故事终坠下乘”^[16],创作武侠实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相“逼迫”^[21]。后来给刘云若《湖海香盟》作序,仍不忘感叹“何日不愁盐米,得泰然拈笔,写其所欲写耶”^[17]。

其实,无论“新文学”或“通俗文学”,都无法摆脱“为稻粱谋”之嫌,不过在“新文学”不如“通俗文学”赚钱的情况下,不能靠创作维持生计的新文学家,作为文化精英或革命先锋,都有各自的出路。而宫竹心如果还想“笔尖下讨生活”,只能转而写通俗作品^[18]。在晚清以来“感时忧国”的时代氛围中,“新文学”掌握了话语权,通俗文学却被当做“逃避现实,苟投俗好”的“游戏文字”。一度自命为“鲁迅信徒”^[19]的宫竹心,既接受这一等级划分,偏又“以传奇的武侠故事出名”,只能“引以为辱,又引以为痛”^[20]。张赣生曾指出白羽的“悲剧性”,若不是看不起武侠小说,凭他的文学修养,可以把武侠小说写出更高水平^[21]。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韩云波指出,正因“白羽从一开始就对武侠较为反感”,才使他能“从西方小说对新文艺的影响和他个人困苦的切身遭际出发”,改造“30年代武侠传奇神格化和武侠人物共性的世俗模式”,并“以‘反武侠’的姿态进行武侠反讽”,这一“寻求武侠内部突围的道路”,部分挽回了“武侠神话的负面影响”^[22]。

尽管以“政治压倒审美”的对武侠小说的激烈批评,自30年代便未停歇过^[23],但毕竟还相对维持了文化上自由选择的局面。而50年代之后的武侠小说在“传统的娱乐性与现代的改良性二者之间歧路彷徨”^[24]的状态则难以为继了。1949年9月5日,《文艺报》社召开平津地区长篇连载小说作者座谈会,“研究章回体小说的文艺形式的写作经验与读者情况,讨论怎样发展并改革这种形式”。陈企霞的开场白说:“不管哪一种文艺形式,当其被很多人所欢迎或注意时,我们就不能置之不问”,要灌输进新的内容,“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为人民服务”。这意味着要“对于自己过去的写作一致地加以批判”,白羽和其他与会的通俗小说作者在此都被纳入到一个匿名的整体中了^[25]。

此后,白羽主要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仅在1956年受香港《新晚报》之约而重拾旧笔。当时,在文化部“为了肃清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而发的通知中,他刚被列入“专门编写含有反动政治内容或淫秽色情成分的神怪荒诞的武侠小说”作者名单^[26],却又无奈接受这“政治任务”,在武侠框架中纳入阶级斗争的“进步内容”,这不能“随心所欲”的结果,只能将《绿林豪侠传》变成“非驴非马的一头四不像”^{[1]182}。他“自我解剖”道:“作为一个鲁迅信徒而变成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而且小说里面还运用了英司各特和法大仲马(又绕上莫泊桑、契诃夫),我成功了,然而我丢人了。”^[19]溢于言表的,尽是愧疚和无奈之情。

四、结语:评判白羽武侠小说创作的知识路径

刻意区分小说创作的新旧雅俗,给出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评判,衍生出两条评判白羽武侠小说创作的知识路径:一是附会他的种种妄自菲薄的夫子自道,认为“为了活命,他竟不惜违背鲁迅的教导,在文学道路上开倒车,专写一些低级混饭、所谓‘畅销’的商品化小说”,对他不能成为“新文艺家”这一“不可弥补的损失”而深感“遗憾”^[27];一是认为因秉持“新文艺观点”而激发的“痛苦与反省,对宫氏武侠小说创作也带来积极的、有益的影响”,在“神魔乱舞”的“武侠世界开辟了一片较新的天地,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28]。这两条阐释路径,一条盛行于80年代之前,已渐不为人所重;另一条兴起于80年代之后,似乎已成定论。当武侠言情卷土重来之时,有一本“白羽原著”的连环画册《偷拳》竟至“印行五百万本”^[29]。于是,寻找宫竹心武侠小说不落窠臼之处,赐以“社会批判”之名,归结为曾在鲁迅指导下从事新文学创作及外国小说翻译的影响,成为新的替代性阐释。这一阐释虽淡化了“政治正确”标准,但却在“以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揭示而呈现出‘反武侠’的倾向”^[28]的表述中,祭出“艺术”和“启蒙”的大旗,似乎其之所以被肯定者,仅是因为宫竹心在鲁迅感召下积极吸收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从而在日后创作实践中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位,使一种原本“混饭吃的东西”具备了“新文学”的某些特征和价值。而之

所以如此,不过是建立在既有的新旧雅俗等级划分基础上的文学精英意识企图招降纳叛罢了。

参考文献:

- [1] 梁守中. 武侠小说话古今[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179-180.
- [2] 白羽. 话柄[M]. 天津:正华书局,1939.
- [3] 唐弢. 清水安三会见记[M]//唐弢文集:第4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247.
- [4] 鲁迅. 致周作人(210727)[M]//鲁迅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8.
- [5] 宫白羽. 关于鲁迅先生的几封信[J]. 新港,1956(4):6.
- [6] 鲁迅. 致宫竹心(210729)[M]//鲁迅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7] 鲁迅. 马上日记[M]//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5.
- [8] 耿庸. 鲁迅传记中缺损的一页——鲁迅和宫白羽[J]. 世纪,2001(3):46-48.
- [9] 冯育楠. 泪洒金钱镖——一个作家的遭遇[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
- [10] 鲁迅. 致周作人(210917)[M]//鲁迅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5.
- [11] 鲁迅.《坏孩子》附记[M]//鲁迅全集:第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5.
- [12] 鲁迅. 致李秉中(240924)[M]//鲁迅全集:第1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2.
- [13] 俞芳. 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与朱夫人[G]//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 鲁迅回忆录.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82.
- [14] 韩云波. 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J]. 江汉论坛,2002(10):82-86.
- [15] 叶洪生. 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54.
- [16] 白羽. 十二金钱镖·三版自序[M]//白羽. 十二金钱镖:上册.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15.
- [17] 白羽. 刘云若《湖海香盟》序[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86.
- [18] 郭娟. 民国的武侠小说家[N]. 经济观察报,2009-6-10.
- [19] 宫白羽.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的我个人的衷心话[J]. 新港,1956(6):24-25.
- [20] 叶冷(郭云岫). 白羽及其书[M]//白羽. 话柄. 天津:正华书局,1939:119.
- [21] 宫以仁,宫捷. 十二金钱镖:六十年的评说——评介白羽及其书[M]//白羽. 十二金钱镖:上册.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8.
- [22] 韩云波. “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8-24.
- [23] 刘中望. 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6-40.
- [24] 韩云波. 中国侠文化·主持人语[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6.
- [25] 杨犁. 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记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G]//洪子诚.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16.
- [26] 文化部. 关于续发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参考目录的通知[G]//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8辑(1956年).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2.
- [27] 郑心伶. 鲁迅与青年作家[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171.
- [28] 袁良骏. 鲁迅的七封信和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J]. 鲁迅研究月刊,2003(11):4-8.
- [29] 宫捷. 鲁迅与通俗小说作家白羽——写在鲁迅六十周年和白羽三十周年忌辰[J]. 通俗文学评论,1997(2):100.

责任编辑 木云